

# 经典缺失的诠释与补亡

——论宋人对“杜甫不赋海棠”的讨论与书写

沈 扬

**内容提要** 宋代文人对于“杜甫与海棠”的关系表现出浓厚的阐释兴趣，并提出了不少推论和主张。限于材料，“杜甫究竟写没写海棠”已经不能定谳，但这一话题成为文人普遍关心的事实背后却彰显着阐释行为的历史性特征，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此外，宋代题咏海棠之作的腾盛与宋人的补亡心态不无关联，与其说宋人是在补杜诗之亡，倒更像是一场与杜甫的文学竞技。他们形塑了杜甫诗学的典范地位，也尝试去超越典范。

**关键词** 杜甫 海棠 阐释 补亡

“杜甫不赋海棠”是杜诗阐释史的一大悬案，这一悬案经由晚唐五代的薛能、郑谷发轫以来，至宋代便成为了文人普遍关心的话头。它类似禅门公案一般，引得无数学者诗人对之进行品头论足。因为材料的不足，本文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历史上的某一种观点，也不能凭所见的材料来提出更加圆满周到的假说。换句话说，澄清历史事实并非笔者的意图，本文所要追问的，乃是这一公案究竟如何成为文人关心的问题，以及在不同观点背后所彰显的心态；并运用阐释学的方法来探究争论出现的原理及其所能够反映的理论价值，并且循着“知识考古”的思路来揭橥命题背后的文学史意义。

## 一 学术史回顾

“杜甫不赋海棠”是晚唐以来至为文人雅士津津乐道的一个文学史公案，最先提出此问题的是晚唐的薛能。他认为“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工部子美于斯有之矣。”<sup>①</sup>在薛能看来，蜀海棠“一时开出一城香”，而杜诗偏偏未及只言片语，甚是可疑。然而，薛能的重点还在海棠，对杜甫不写海棠的原因并没有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作为问题的引出者，薛能却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与之同时并为好友的郑谷则第一次在诗中表达了自己对杜甫不写海棠原因的猜测，《蜀中赏海棠》：“浓淡芳春满蜀乡，半随风雨断莺肠。浣花溪上堪惆怅，子美无心为发扬。”<sup>②</sup>所谓“无心”，为无所用心之意，意为因天气惨淡，杜甫尚无从顾及海棠之娇艳多姿，故不曾书写。郑谷的偶然一说，兴致所至，却不曾想为后世留下了一桩悬案。心仪杜甫而又深受其影响的宋人围绕上述话头，聚讼纷纷，莫衷一是，综合看来，大体有五种观点：1. 杜甫因未见海棠而未写。如杨万里《海棠四首》（其四）：“岂是少陵无句子，少陵未见欲如何。”<sup>③</sup>2. 避母讳而不写。此说见晚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卷八引《古今诗话》：

① 陈思《海棠谱》下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5册，第139页。

② 《全唐诗》卷六七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34页。

③ 《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册，第26494页。

“杜子美母名海棠，子美讳之，故《杜集》中绝无海棠诗。”<sup>①</sup> 这种说法显然是为了满足文人索隐的兴趣而产生，诚不足论。3. 遗失说。陆游《海棠》：“拾遗旧咏悲零落，瘦损腰围拟未工。”<sup>②</sup> 但陆游却又在另一首六言诗中表达了另一种观点，《六言杂兴》（其六）：“广平作梅花赋，少陵无海棠诗。正自一时偶尔，俗人平地生疑。”<sup>③</sup> 这样一来，杜甫不赋海棠又不成为问题了。4. 无心赋海棠说。这种观点可以说是郑谷的延续，但却出现了两种“无心”的原因。第一种以王安石为代表，认为杜甫因被别的花（如梅花）吸引了眼球，故无心赋海棠，王安石《与微之同赋梅花得香字》（其二）：“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sup>④</sup> 南宋李龔与王安石持同一声气，《梅花集句》（其八九）曰：“少陵苦被花相恼，可是无心赋海棠。”<sup>⑤</sup> 而另一种声音则因为特殊的文化语境，将无心赋海棠与杜甫的忧国忧民精神联系在一起，如南宋王柏“当日杜陵深有恨，何心更作海棠诗。”<sup>⑥</sup> 王柏以理学家的眼光来审视杜甫不写海棠的原因，故“海棠”等与道相妨的琐碎闲言自不应入诗。以上是“杜甫不赋海棠”这一话头自晚唐薛能提出以来，宋人对其所进行的回应和推测，似乎并没有一种完满的解释可以服众，其中有不足论者如“避讳说”，甚至为了替杜甫回护声辩，称《春夜喜雨》“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中的“花”便是海棠，然问题是，杜甫这句本出于想象，并未亲眼见证，则辩护者显然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反倒过犹不及。

对于古人的种种揣测和质疑，当代学者做出了不同角度的回应。例如日本学者岩城秀夫从文人对海棠的审美观念之转变的角度对此一问题作了可能性的解读，孤文先发，论证充分<sup>⑦</sup>；台湾张高评教授则循此线索，对宋代咏海棠诗的艺术手法及其展现的审美意识作了集中梳理，推进研究的同时也垂范后学，转示方法<sup>⑧</sup>。此外，国内尚有王仲镛、子房、吴维杰等先生对此问题作过细致考辨，王、吴二文针锋相对，一从怀疑夏承焘先生的日记入手，支持了杜甫客蜀期间海棠未盛于蜀，因而未见海棠的旧说<sup>⑨</sup>，吴先生从植物学的角度反驳王说，以为海棠与薛涛诗中的棠梨并非同一物种，故杜甫见与未见海棠真花与李德裕镇蜀并不相关<sup>⑩</sup>。复有学者认为，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中的“千朵万朵压枝低”便是海棠云云<sup>⑪</sup>。这种观点禁不住推敲，因为物候学的知识告诉我们，海棠和蝴蝶不可能同时出现于同一季节。职是之故，上述诸家的观点皆以文献学的方法来探讨“杜甫究竟写没写过海棠”，他们的重点始终集中于历史的真伪。然而，由于材料的不足以及解读角度的差异，又始终莫衷一是。

循此，笔者不打算考证杜甫与海棠之间的历史本事，所关心的是这一事实为何在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成为了诗歌典故，被化用入文人墨客的创作中，这足以说明“杜甫不赋海棠”的现象在后代文人中的兴趣的普遍程度。当我们转换研究视角，“杜甫不赋海棠”之成为文人普遍关心的话头的文学史意义便得以呈现。质言之，宋人对杜甫不赋海棠作出种种解读推论，其行为本身便构成了

① 蔡正孙《诗林广记前集》卷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2页。

② 《全宋诗》，第39册，第24321页。

③ 《全宋诗》，第40册，第25293页。

④ 《全宋诗》，第10册，第6630页。

⑤ 《全宋诗》，第59册，第37446页。

⑥ 《全宋诗》，第60册，第38040页。

⑦ 岩城秀夫撰、薛新力译《杜诗中为何无海棠之咏——唐宋间审美意识之变迁》，《杜甫研究学刊》1989年第1期。

⑧ 张高评《自成一家与宋诗宗风》，台湾万卷楼2004年版，第137页。

⑨ 王仲镛《杜甫无海棠诗辨》，《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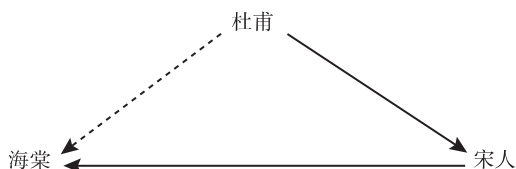
⑩ 吴维杰、吴柯《薛涛〈棠梨花和李太尉〉与西川海棠辩证——王仲镛〈试论西川海棠与薛涛〉质疑》，《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⑪ 子房《杜甫不咏海棠之迷》，《文史杂志》2004年第2期。

对杜甫及其诗歌的阐释,属于文学接受的意义范畴。阐释行为发生的背后既折射出杜甫在后代诗人心目中的典范地位,同时也体现了阐释的历史性特征,换句话说,“杜甫不赋海棠”之所以成为问题,除了唐宋文人对海棠审美观念的变化之外,与宋人对杜甫的形塑不无关联。这一问题实际是在杜甫与宋人的关系中形成发展的,因此,只将目光投射在杜甫抑或宋人身上都不能完满地看到问题背后的意义。基于此,本文所要追问的是,在宋人“好奇和冲动”所引发的种种阐释行为中,究竟可以体现怎样的理论意义,同时,宋代大量的题咏海棠之作的产生究竟与“杜甫不赋海棠”这一典故存在怎样的历史联系,这种联系又反映着宋人怎样的创作心态。

## 二 宋人眼中的“杜甫与海棠”:理解的历史性特质

杜甫究竟有没有写过海棠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宋代杜诗阐释学中的一个颇有趣味的话题,它兼涉及杜甫其人、其诗以及宋人对杜甫形象的建构和他们自己的文化心态等多个方面。阐释行为的发生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观念、历史视域联系在一起,这种关系构成了阐释者和被阐释者各自的历史世界,先验的历史世界不期而然地会影响到阐释行为及其效用,从而导致了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发生<sup>①</sup>。对此,孟子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因此,他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阐释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依照孟子的本意,二者当互为前提,交替使用,方能避免“断章取义”的发生。然而孟子的阐释理路本身便隐含着“文本与解释”、“作者与读者”、“历史与当代”多重对立共存的关系,阐释行为实则是在这些关系中产生效果的。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sup>②</sup> 为了更加清晰地体现“杜甫—海棠—宋人”之间存在的关系,笔者拟通过下面的图形加以形象地说明:



图中杜甫与海棠的关系用虚线表示,而“宋人与杜甫”、“宋人与海棠”皆示之以实线,它暗示“杜甫与海棠”的关系存疑,宋人发现了海棠的审美价值以及杜甫对宋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历史事实,于是,原本历时性的前后顺序就构成了一种共时性的“在场与缺席”的场域联系。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究竟写没写过海棠”其实已经转化为一个阐释学的经典案例,它牵涉着杜甫自身的创作特质、宋人的审美眼光以及杜甫对于宋人的影响三个方面。所以,宋人对杜甫蜀中诗作缺少海棠的质疑首先应该从杜甫自身创作找原因。

从杜甫蜀中创作来看,宋人的疑惑并非毫无根据。他们心仪于杜甫的蜀中创作,对其萧散自然的风格特征、精工细腻的体物笔法、中和自适的抒情范式仰慕已久,并对其身远江湖而心恋魏阙的风骨推崇备至。杜甫自乾元二年(759)季冬入蜀,至永泰元年(765)离开草堂赴戎,前后六年,在这段时期中,杜甫共创作了四百二十一首诗<sup>③</sup>,几乎占到了其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单纯从咏物一体来考察,此一阶段也是杜甫大量创作咏物诗的开端,为了将杜甫蜀中的咏物诗创作更加清楚地再现出来,

① 周裕锴《中国古典诗歌文本类型与阐释策略》,《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② 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

③ 此根据清仇兆鳌《杜诗详注》统计。

兹列表如下:

物类	植物	动物	图画	器物
数量	33	14	9	10

从表中可以看出,杜甫蜀中咏物诗中吟咏花草等植物物色占了半数之多,这其中既有丁香花、丽春花、栀子花等常规的题材,亦有源于杜甫特殊心境而发现的题材如恶木、病柏、枯枏、病橘等带着病态或丑怪的物类,将丑怪物色入诗是杜甫蜀中咏物诗歌的一大特色,对宋人以丑为美的审美观具有先导意义。若将现存一千四百余首杜诗题材作集体分类,则对花草类植物题材的热衷和题咏仅仅出现于杜甫的蜀中生活期间,而夔州诗中动物类题材则呈现上升趋势,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与作家生活环境和晚年心境的变化有着潜在的同构性。另一方面,蜀中生活体验成就了杜甫诗学的别调。因为远离政治中心长安,暂时免却了繁忙的公务和琐碎的人事,故诗人能以闲雅恬淡的心态去体验周边的生存环境,以审美的眼光体察寻常物性中的美感动态,如“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sup>①</sup>(《卜居》)“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sup>②</sup>(《为农》)“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sup>③</sup>(《狂夫》)“练练峰上雪,纤纤云表霓。”<sup>④</sup>(《泛溪》)“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sup>⑤</sup>(《水槛遣心》)宋人叶梦得赞之曰“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sup>⑥</sup>体物笔法的成熟是蜀中生活对于杜甫最大的馈赠,他自己又何尝不这样认为“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sup>⑦</sup>(《后游》)“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sup>⑧</sup>(《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仿佛万相毕来诗人眼前,应物而感,诗兴萌发,别寄怀抱。总之,杜甫蜀中的咏物诗呈现出日常性、随机性的特色,情感被自然而然地隐喻在物色的描绘和物理的探究中,从这个角度而言,杜甫蜀中诗学已经隐然导夫宋人中和博雅的风格路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继往开来而又独具慧眼的诗人,如何会遗落了蜀中奇花“海棠”?对此宋人曹勋的诗歌颇能反映他们对这一不合常理现象的疑惑“海棠盛西蜀,豪压春风途。三月浣花溪,游人鄙金珠。少陵时居瀼,诗史切太虚。独不披品藻,此理端何如?”(《山中杂居九十首》其四七)<sup>⑨</sup>

这一疑窦的滋生体现着宋人对杜诗研习的深入细微,同时,也反映着宋人在理解杜甫及其诗歌时的“历史性”特征,这种历史性是由人类存在方式的历史性来决定的。伽达默尔指出“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sup>⑩</sup>前代的文学经典向后代读者敞开着无数理解的法门,当作者完成作品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失去了解释的权利,让位于后代的读者去尝试填补和建构。而选择何种方法来进入经典的意义集合取决于阐释者自身的历史世界,传统阐释学中所谓的“本意”对于后来读者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他们的历史存在决定着他们理解的方式的局限,而这一理解方式本身则成为文学经典之所以发生效果、产生影响的前提。经典的一大特征在于它暗含了多重阐释可能,其意义总是在阐释中得以呈现。杜诗典范地位无疑是在宋人的理解、阐释中得以确立的,

① 《杜诗详注》卷九,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29页。

② 《杜诗详注》,第739页。

③ 《杜诗详注》,第743页。

④ 《杜诗详注》,第769页。

⑤ 《杜诗详注》,第812页。

⑥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1页。

⑦ 《杜诗详注》,第787页。

⑧ 《杜诗详注》,第781页。

⑨ 《全宋诗》,第33册,第21204页。

⑩ 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第380页。

也就是说,宋人根据自己的历史世界建构了杜甫其人及其诗学经验。他们通过研习杜诗,总结出了一系列关于句法、用韵、用典、遣词、炼字的创作技法,同时又从杜甫诗歌中读出了“一饭未尝忘君”、“诗史实录”等精神境界,表达对杜甫认同的同时,也建构了别具宋型文化特征的宋代诗学规范。

循着阐释历史性的逻辑,我们便可以理解,宋人之所以对于“杜甫不赋海棠”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是因为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既有的对于海棠的审美性体验出发,去理解杜甫及其诗歌中的空白,这是由他们的历史性特征来决定的。葛立方《韵语阳秋》:“杜子美居蜀累数年,吟咏殆遍,海棠奇艳,而诗章独不及,何邪?”<sup>①</sup>这一句本身就包含了两种时间向度:首先是杜甫的历史存在方式,即蜀中生活日久,吟咏众多;其次是葛立方的历史世界,海棠的审美价值之发现实际是晚唐以来的事情,宋人进一步渲染了海棠的殊姿美态,发现幽藏其中而又切合自己性情趣味的美感。这从唐宋两代海棠诗的创作规模上可以看出,《全唐诗》题咏海棠者才十一家,计十八首,而宋代咏海棠诗则多至七百余首,仅陆游一人就有二十余首海棠诗,其余如王禹偁五首,晏殊四首,梅尧臣五首,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陈与义各两首,黄庭坚、张耒、晁补之、朱熹各一首,范成大十六首,杨万里二十三首,刘克庄二十八首<sup>②</sup>,此外尚有不知名文人如郭镇、李定、范镇、杨谓、凌景阳、郭震、吴中复等人的题咏之作,足证海棠在宋代文人中的地位之高。以至南宋书贾陈思为之作《海棠谱》,网罗唐宋文人关于海棠的轶闻韵语,其意非徒售利,兼反映文人题咏海棠的兴趣。总之,海棠审美价值的发现是宋人的功劳,尤其苏轼的两首题咏之作,咏物精工,寄托深远,在士大夫中能引起广泛的影响,其后许多文人在题咏海棠时化用其名句,形成了良性的传播效应;陆游、范成大皆曾镇蜀,更得以异乡人之姿态亲证西蜀海棠的娇艳玲珑,因此,他们分明是以自己的审美意识先入为主地作了如下思考:既然海棠如此幽美,而杜甫客蜀期间又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其中植物类题材占多数,在这个先入为主的价值观念的前提条件下,就自然推出杜甫应该赋写海棠才对。殊不知宋人其实是以今隶古,从自我的价值立场出发去判断历史发生的有无;事实上,在杜甫与海棠这一关系中,在场的是宋人,而杜甫却恰恰处于缺席的状态。宋人仅仅作到了“以意逆志”,却忽略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 三 从经典补亡到超越典范:宋人补杜诗之亡的文化心态

杜甫不赋海棠之所以在宋代引来诸多纷争聚讼,诚然是宋人对杜甫阐释过程中的建构性和历史性使然,然而,这仅仅解释了为何宋人对此一小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兴趣背后究竟反映了宋人怎样的文化心态?杜甫集中缺少题咏海棠的作品,与此形成对应的是《全宋诗》、《全宋词》中存世的数百首题咏海棠之作,笔者认为宋人对于海棠的发现并乐于题咏之,并非仅仅源于花卉审美观念的变迁,至少从现存宋代“海棠诗”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诗人题咏海棠时,明确指出自己要补杜诗之亡阙。只是这种补亡并非如其产生之初那样严肃刻板,重视“活法”的宋人在补杜甫亡诗时更多带有闲雅游戏的意趣。那么,描述这一现象并恰如其分地去尝试对其背后的文化心态进行推测和阐发,则应是本节的重点所在。此前,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补亡”观念及其形态作一番历史性地梳理,以期更能彰显宋人补杜甫之亡的特殊性。

因文献散佚的程度不同,“补亡”也具有了“补佚”和“补缺”两类体格,由此也就奠定了补亡文学的两种范式,曹辛华先生定义“补亡诗”为“补写原有之失或补写原来根本没有之作而产生的

①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六,《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1页。

② 转引自张高评《自成一家与宋诗宗风》,第137页。

一类诗。”<sup>①</sup> 这一定义基本涵盖了“补亡诗”的两种类型。早期中国文学的补亡对象常常是“诗”与“乐”，汉代就有对“有序无辞”或“有弦无辞”之古琴歌进行补亡的传统。蔡邕《琴操》属于补古乐府，第一次以“补亡”作为篇名的则是西晋束皙的“补亡诗”<sup>②</sup>，其被萧统编选入《文选》“诗”的开篇，据何焯看，这样安排是为了“继三百篇之绪”<sup>③</sup>，显然带有宗经垂范的意思。根据题下注文引束皙《补亡诗序》，大概因周成王诗存其义而亡其辞，故赋以补亡。束皙“补亡诗”的出现配合了西晋政治上的复古思潮，这股复古之风在文学史上掀起了一股拟古作伪的风气，束皙《补亡诗》可以看作是另一种意义的拟古，与六朝托古作伪的常规路数尚有区别，当时的潘岳、夏侯湛都曾写过类似题材的四言雅诗，无非是政治形势和处身立命的需要。早期补亡之作大多为文造情、质木无文，写作者常常处于失语的状态，他们只是在努力模仿所补对象的语气和风格，尤其对于“补经典之亡”的作品来说，连字句都要极力模仿经典的味道，这样很难说表现了多少自己的兴趣。这种尴尬的局面至齐梁才稍有转机。例如萧统《咏山涛王戎》二首序乃称颜延之《五君咏》不咏山涛和王戎，可见他是出于对山、王二人的仰慕，颜延之不写二人，萧统认为不足，故笔补其失。这已经不同于束皙《补亡诗》的创作心理和范式，尽管因所补对象不同而造成风格的迥异，但束皙本意在述而不在作，萧统则全然凭空虚拟，因此带有更多尚友古人、追慕先贤的意图。六朝是中国诗学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大量文人通过模拟经典、仿效同时或先前的作品以熟练掌握为文之枢机，因此，六朝也是补亡诗、拟古诗集中出现的时段，它们构筑了极其古雅朴拙的文学景观。

“补亡”心态在唐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体认，唐代文人的补经典之亡、补古人或时人之亡、补乐府之亡的作品甚多，补亡之“义”由单一朝向多元化发展，补古乐如元结《补乐歌》、韩愈《续补琴操》、皮日休《补周礼九夏系文》；与此同时，中唐时期的文人已经注意到补前人未写之题材如白居易“遍览古今集，都无秋雪诗。”<sup>④</sup>（《和刘郎中望终南山秋雪》）“下马闲行伊水头，凉风清景胜春游。何事古今诗句里，不多说著洛阳秋。”<sup>⑤</sup>（《秋游》）此外，白居易也以调侃的笔法“补自家之亡”：“犹无洛中作，能不心恨恨？遇物辄一咏，一咏倾一觞。笔下成释憾，卷中同补亡。”<sup>⑥</sup>（《洛中偶作》）这种情况也见于刘禹锡的创作，兹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以戏谑调侃的口吻补前人之亡，这已隐然导夫宋人游戏文学之先路。宋人带着极强的道统意识，以继往圣绝学自诩，欧阳修继郑樵之后补《诗谱》之亡，柳开干脆自命不凡地号曰“补亡先生”，虽曰大言，却足见他们述三代之道以自任的使命感，有补斯文成为宋代士大夫的普遍价值认同，士大夫在补经典之亡过程中体验着乐道的生命情怀，同时也提升了古文创作的水平；在文学创作领域，“补亡”成为文人交游奖掖的一种方式。例如，《思子台赋》本苏轼乡人史经臣作，苏轼“记其意而亡其辞，乃命过作补亡之篇，庶几君子犹得见斯人胸怀仿佛也”<sup>⑦</sup>，这是以补亡来追忆旧游；苏轼因孟嘉《解嘲》久失其辞，“因戏为补之”，此虽补前人佚文，却是一空依傍而自铸伟词，游戏的成分远大于模仿；楼钥赞赏友人惠赠“米缆”，作《陈表道惠米缆》：“束皙一赋不及此，为君却作补亡诗。”<sup>⑧</sup>此以补亡之说法酬谢友人的馈赠。这里我们看到，补亡创作已经失去了当初“据义补辞”的原貌，从一种作家缺席的零度写作转而为在场的创造，这

① 曹辛华《论中国诗歌补亡精神——以〈文选·补亡〉诗为例》，《文史哲》2004年第3期。

② 为了防止误解，这里有必要作出界定“补亡诗”最初是以诗体的形态出现的，本文所探讨的并非补亡、拟古等诗体问题，而是将补亡作为一种文化心态和创作行为去加以梳理和阐发。

③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87页。

④ 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六，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94页。

⑤ 《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七，第2138页。

⑥ 《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八，第706页。

⑦ 苏过著、舒大刚等校注《斜川集校注》卷七，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456页。

⑧ 《全宋诗》，第47册，第29386页。



不得不说是补亡意识在宋代的大发展<sup>①</sup>，它与宋代诗歌的交际效应结合在一起，成为文人相互联系的一项工具。那么，宋人的“补亡”意识与宋人关注杜甫不赋海棠这一问题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呢？这还要从杜甫对诗歌题材的开拓及其对宋代文人写作的影响说起。

诗歌发展到宋代，众多的写作题材已经被开发殆尽，这一过程中，杜甫对于诗歌题材的开拓最令宋人瞠目。陈岩肖认为“少陵诗非特纪事，至于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亦时见于吟咏。”<sup>②</sup>这已初步道出和王安石一样的感慨，而在胡铨看来，“（少陵）仰观天宇之大，俯察品汇之盛，见日星霜露，丰隆裂缺，屏翳沆瀣，烟云之变灭，云岩邃谷，悲泉哀壑，深山大泽，龙蛇之所宫，茂林修竹，翠筱碧梧，鸾鹄之所家，天地之间，诙诡谲怪，苟可以动物悟人者，举萃于诗”<sup>③</sup>。可见，当宋人面对杜甫这座艺术高峰时，不仅倾赏他的儒者精神，更心仪杜甫“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博观约取，摆在宋人面前的，不单单是词法、句律等形式层面的技术创新，首当其冲令他们感到焦虑的恐怕是如何规避陈腐题材，开拓诗歌创作新世界的问题。盖不能新变、无以代雄，宋代文人必须找准临摹典范与变化生新二者之间的最佳关节点，才能独辟蹊径，成就另一番诗学境界。

为此，宋人在题材方面的拓展遵循着两种相反相成的路线：一是关注前人已经写过的题材，对其进行写法上的深化。所谓“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sup>④</sup>，正可以代表宋人的一种取材思维。具体咏物诗而言，最具“我宋”风神的恐怕就是“白战体”，因其避熟就新、因难见巧，兼舒卷胸中学问与个人才情于一体，故深合宋人雅趣，宋代禁体咏物诗大量出现，写法登峰造极，充分体现宋人欲变前人的创新精神；二则是欲变前人已说，不如转而去关注前人不曾言及的题材。杜甫诗集中竟然未能留下对于海棠的只言片语，这在宋人看来诚然有疑惑不解之处，反面而观，正为他们留下了一片可供开拓的诗世界。这样看来，大量的题咏海棠的诗词在宋代的产生似乎又可以从这一角度得到解释，宋人一方面要求自己的诗作像杜甫那样笔补造化，另一方面则又希望能从杜甫诗歌中去寻觅空白，赋咏海棠无疑切合了宋人的这一心态，与其说是补杜甫之亡，不如说是宋人的一场诗学狂欢，在这场题材竞赛中，他们享受到了超越榜样的乐趣。其实，这种体验自晚唐薛能已经兆示端倪，这从薛能《海棠诗序》<sup>⑤</sup>可以看出：

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工部子美于斯有之矣。得非兴象不出，殁而有怀？何天之厚余，获此遭遇。

可见，薛能发现杜甫不曾题咏海棠，因此感到兴奋，仿佛上天对他的恩赐一般。在宋人眼中，薛能的文学成就并不高，这篇序文如果真是薛能所写，则它说明至少在晚唐杜甫的声誉已经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同，而薛能多少有些自不量力、大言不惭了。

如果说，薛能尚非有意“补亡”杜诗的话，黄彻《碧溪诗话》中对东坡《柯丘海棠》的指认，则似乎可以说明问题。其曰“东坡《柯丘海棠》长篇冠绝古今，虽不指明老杜，而补亡之意盖使来者自晓也。”<sup>⑥</sup>黄彻认为，东坡《柯丘海棠》冠绝古今，他之所以写海棠是为了补杜诗之亡，尽管东坡并没有明确说明；而赵次公在次韵东坡《定惠院海棠》时又分明道破“此花本出西南地，李杜无诗恨遗蜀。高才没世孰雕龙？后辈补亡难刻鹄。”<sup>⑦</sup>与黄彻不同之处在于，赵次公认为李杜那样的天才都不

① 这里笔者仅仅强调宋人“补亡”心态的一个侧面，也即游戏的性质，目的在于与本文主题相切合。其实，“补亡”心态在宋代尚有形式，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举例。

② 陈岩肖《庚溪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7—168页。

③ 胡铨《僧祖信诗序》，《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册，第268—269页。

④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0页。

⑤ 陈思《海棠谱》下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45册，第139页。

⑥ 黄彻《碧溪诗话》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⑦ 陈思《海棠谱》下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45册，第150页。

曾题咏海棠，后来者即便想补其缺省亦难以达到他们那样的境界，但二者在补亡这一创作心态的揭示上是一致的。巧合的是，《定惠院海棠》也正是苏轼平生自诩的佳作，而翻检南宋人咏海棠之作也会发现，“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屡屡被化用，足证此诗在后世文人群体中产生的影响效应。此外，诗人在咏海棠诗中明言补杜甫之失的尚不在少数。他们在诗歌中对于杜甫不赋海棠所抱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明言补杜甫之缺漏，显示出极强的自负，如梅尧臣《送晋原乔主簿》：“刻意咏芳菲，追补李杜失。”<sup>①</sup> 陈与义《雨中对酒，亭下海棠经雨不谢》：“燕子不禁连夜雨，海棠犹待老夫诗。”<sup>②</sup> 方岳《次韵海棠》：“不遇少陵休怅惋，醉中试作补亡诗。”<sup>③</sup> 有的则替杜甫感到惋惜，又为海棠打抱不平，如王十朋《郁师赠海棠酬以前韵》：“杜陵应恨未曾识，空向成都结草堂。”<sup>④</sup> 《郡圃无海棠，买数根植之》：“少陵诗史有遗缺，海棠名花辄淹没。”<sup>⑤</sup> 杨万里《送丘宗卿帅蜀三首》（其二）：“二月海棠倾国色，五更杜宇说乡情。少陵山谷千年恨，不遇丘迟眼为青。”<sup>⑥</sup> 甚至有诗人以戏谑的口吻调侃杜甫，如喻良能《次韵伯寿兄海棠》：“无情常笑杜陵老，不识海棠春意好。”<sup>⑦</sup> 释了惠《送人归昌州》：“见说家山富海棠，杜陵才短没篇章。烦君开口道一句，撝掇教他分外香。”<sup>⑧</sup> 当然，也有诗人对杜甫依然怀着敬畏之感，赵藩《沅陵见招赏海棠病不能往辄尔言谢三首》：“少陵当日犹无语，而我何人敢漫狂？”<sup>⑨</sup> 无论态度如何，事实便是他们代杜甫补写了海棠，从结果来看，诗人对于杜甫究竟写还是没写海棠并没有亲证其实的意思，而是以游戏的心态、诙谐的口吻和轻松的笔调去化用这一历史典故，与其说补亡杜甫倒不如说是炫耀自己的意外发现，发泄内心的快感或许更能揭示宋人补杜甫海棠诗的创作体验。这样独特的“补亡”创作已经迥异于其最初“据义补辞”的形态，而更能体现出宋人独特的文学气质，他们在承认杜甫及其诗歌的典范意义的同时，也每每欲与之博弈，这或许是宋诗能自立诗国、与唐诗分疆辟域的原因之一。

## 结 语

相比于唐人的豪放而言，宋人则更多地显得内敛而老成，特殊的文化性格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理性精神。格物致知作为宋人重要的学问方法对他们行身方式、思维气质以及价值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希望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中去寻觅背后普遍的道理，通过类似的“格物”而达到“致知”的目的。杜甫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被发现进而被理解和阐释的。宋人究心于杜甫其人其诗兼及其时代，从杜甫身上领悟为人、作诗的“真理”，他们寄心杜甫曾经言说的题材，更关心他不曾经眼的物类、典故，对后者的发现足以令他们沉醉其中。杜甫“诗圣”的地位是由宋人建构出来的，他们在推崇杜甫诗学典范的同时，也体验着超越典范、填补杜诗空白的快感。

【作者简介】沈扬，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发表过论文《寒士心态与西晋咏物赋》等。

（责任编辑 刘京臣）

- ① 《全宋诗》，第5册，第3054页。
- ② 《全宋诗》，第31册，第19534页。
- ③ 《全宋诗》，第61册，第38406页。
- ④ 《全宋诗》，第36册，第22655页。
- ⑤ 《全宋诗》，第36册，第22860页。
- ⑥ 《全宋诗》，第42册，第26556页。
- ⑦ 《全宋诗》，第43册，第26933页。
- ⑧ 《全宋诗》，第61册，第38109页。
- ⑨ 《全宋诗》，第49册，第30794页。